

公共政策研究

[2014] 2 月专号

二〇一四年二月九日

中国城市居民公共政策 满意度调查报告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唐文方

摘要

- 本报告从实证方法入手，对中国城市居民的公共政策满意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其数据来源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2013 年 11 月完成的全国 10 城市 2000 个居民的随机抽样电话调查，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昆明、乌鲁木齐、沈阳、武汉、西安。
- 在调查中列举的 20 项公共政策中，满意度最低的前五项分别为 1) 食品安全，2) 物价稳定，3) 社会平等和住房



保障(并列第三), 4)工资收入和政府廉洁(并列第四), 5)环境保护和政府回应度(并列第五)。

- 满意度最高的前五项分别为 1) 民族和谐, 2) 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 3) 言论自由, 4) 社会治安和工作机会(并列第四), 以及 5) 高考制度。
- 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 2013 年 11 月城市居民的满意度有明显的提升, 即便是对一些相对不满的政策, 例如物价, 社会平等, 住房, 政府廉洁等等, 其不满程度都远低于 1989 年的水平。
- 从城市间的差别来看, 广州和重庆是两个极端, 前者的平均满意度排在 10 个城市的最后, 而后者则名列榜首。在 20 项政策中, 广州有 15 项垫底, 而重庆有 14 项都是 10 个城市中最高的。这可能与当地政府与本地居民的沟通能力有关, 也可能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广州公民权力意识比较强, 两地市民选择参照的目标体系不同。
- 媒体对公众的政策满意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我们的调查针对电视和网络媒体的作用展开, 有意思的是, 两者有着截然相反的作用, 看电视新闻会提高政策满意度, 看网络新闻则会降低满意度, 这与两者的内容的差别有关系,

如果要防止网络的负面效应，对网络媒体负面内容的改进就变得很有必要。

- 本报告还对当前热点问题之一的幸福感指数做了分析，结果表明，在 25 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民众的幸福感指数是最低的，这可能与中国人目前的生活压力大，工作时长有关系，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
- 除了满意度和幸福感，我们的调查还包括了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结果发现，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显高于地方政府，而且中国的政府信任度也明显高于西方国家。
- 在维权行为方面，中国城市居民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积极性和活跃性，将近 80% 的受访者表示在受到政府不公平待遇时会发起或参与维权行为，其中 12% 的人表示会采取抗争性行为，例如上访游行，请愿示威，或者更激烈的手段，这表明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
- 更令人担忧的是，法院和政府部门这些理应解决社会矛盾的渠道，反而遭到了群众的抵制。本报告的分析表明，受访人的不满意程度越高，就越不会去找法院或政府有关部门解决问题，但更有可能采取抗争性行为。



- 网络媒体虽然为人们发泄不满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环境，但对抗争性维权并没有促进作用，这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利用网络颠覆中国政权的希望是一个阻击。
- 最后，我们的分析发现，法律意识越强，就越不可能参与抗争维权，因此，完善法律体制，加强法律意识，引导民众在体制内解决矛盾，将会有利于社会稳定。

一、中国城市居民公共政策满意度调查

过去 20 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发展，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快速建立，研究内容从借鉴国外理论和历史题材逐步转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从对个案的定性研究扩大到利用大规模数据进行量化研究。

公共政策研究方法的不断科学化，对公共政策研究资料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共政策的对象是公众，因此公众对各项公共政策的评价，是公共政策有效性评估最基本的数据之一。为了收集这类数据，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于 2013 年 10 月开始，就中国城市居民公共政策满意度展开了定期问卷调查。第一期调查从 2013 年 10 月 7 日开始，到 2013 年 11 月 11 日结束。调查对象为分布在 10 个城市的 2000 个受访者，每个城市随机抽取 200 人。10 个城市的选择兼顾了其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地理位置的代表性，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昆明、乌鲁木齐、沈阳、武汉、西安。

从调查内容上看，我们的调查更加侧重于民众对 20 项



重要公共政策的综合评价，包括食品安全、物价稳定、社会平等、住房保障、工资收入、政府廉洁、环境保护、政府回应、政府效率、失业保障、看病就医、低保政策、养老保险、公民权利、高考制度、工作机会、社会治安、言论自由、国家安全、民族平等。今后，在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将对重点政策问题和重点地区进行焦点访谈。

有人可能会说公共政策满意度并不能代表对公共政策自身有效性的评估，例如环保政策对预防环境污染的作用，价格调控对价格稳定的影响，并不能从公众的满意度看出来。对此，我们完全同意，满意度只是政策评估的其中一个方面，它可能与政策的有效性有关系，也有可能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政策满意度与纯技术性的政策评估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满意度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态度和行为，会更直接地决定社会对政府的支持度与社会的稳定性，这一点是纯技术性研究所无法取代的，也说明了对政策满意度研究的必要性。

除了对上述 20 项重要公共政策的满意度调查，我们的调查还包括了受访人对社区政府、市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满意度，他们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受访者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工作时间、婚姻状况、民族、宗教信仰、收入水平、政治面目等等。这些信息使我们能够对公共政策满意度的前因后果进行全面

综合的分析。

在中国，公共政策满意度调查最早始于 1987 年 5 月，并在 1987 年 10 月，1988 年 5 月，1988 年 10 月，1989 年 5 月，1989 年 10 月，1991 年 11 月和 1992 年 6 月就相同的政策问题定期调查中国 40 个城市的居民¹，由当时的中国体制改革委员会旗下的中国社会调查系统执行，曾经成功预测了 1989 年的动乱²。后来，虽然有学者在 1999 年，2008 年，2012 年进行其他社会调查时对一些政策问题捎带进行过重复调查，但没有一项调查是专门针对公共政策进行的。这次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的调查，是继体改委调查后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策调查，其数据与以前的数据连在一起，形成了过去 26 年以来中国民意变化独一无二的珍贵历史资料数据。

通过以上数据，本文将就下列 3 个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 (1) 政策满意度水平及历史变化的比较；
- (2)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对公共政策感到不满意；
- (3) 公众对政策和政府不满意时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

¹ 见唐文方、白威廉著，《中国城市改革》，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 (Wenfang Tang and William Parish, *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 The Changing Social Contra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唐文方著，《中国民意与社会变迁》，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

² 见《陈一咨回忆录》，第七章，新世纪出版社，2013。



二、公共政策满意度分布

我们在调查中对上述 20 项公共政策向受访者逐一提问。为了避免受访人在连续提问中的疲劳，我们将 20 个问题分为两组提问。首先，“您对我国下列各项政策的满意程度是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还是非常不满意？环境保护，社会平等，反腐倡廉，扶助贫困，高考制度，言论自由，民族和谐，政府回应民众需求，保障公民权利，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

其次，“您对您所居住的城市的情况是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还是非常不满意？看病就医，住房保障，养老保障，工作机会，失业救济，工资收入，物价稳定，食品安全，社会治安，政府办事效率”。

每个受访人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会有一个相应的编码，3=非常满意，2=比较满意，1=不太满意，0=非常不满意。总体样本中的 2000 个受访人对每项政策的满意度会有一个从 0 到 3 的平均值。如果将每个平均值除以 3，此平均值就会在 0 到 1 之间变化。例如，如果平均值是在 0-3 之间的 1.8，这个数字在 0 到 3 之间的相对位置不是很一目了然，而 1.8

除以 3 之后是 0.6，0.6 在 0 到 1 之间的相对位置就很容易理解，可以解释为百分比，也就是说样本对此项政策的满意度可以理解为 60%。

另外，我们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加权。这是因为调查样本是通过手机号码随机抽样，而手机用户的特点是年轻男性偏多，从而导致调查样本与所在城市人口的实际特征产生偏差。所谓加权就是用受访人所在城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性别和年龄数据对样本进行修正，使样本的人口特征与人口普查基本一致（见附录一），从而使每个城市的数据更能代表该市的总体人口水平。

1) 最不满意的前五项

表一显示了通过加权后，调查样本中的 2000 个受访人对各项政策满意度的平均值（最左边的竖行，黄色），其中最不满意的前 5 项分别为食品安全（38%），物价稳定（42%），社会平等和住房保障（并列第三，44%），工资收入和政府廉洁（并列第四，45%），环境保护和政府回应（并列第五，46%）。

针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公众的愤怒程度显而易见，这两项政策关系到百姓每天的生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电话调查中，当问到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时，很多受访人表示，用“非常不满意”都无法表达他们的不满，有人甚至说，“我想要骂人了！”



表一、中国分城市公共政策满意度指标

(n=2000, 最大值=1, 加权)

	样本	广州	北京	昆明	上海	深圳	沈阳	乌鲁木齐	武汉	西安	重庆
食品安全	0.38	0.28	0.40	0.39	0.38	0.35	0.40	0.40	0.38	0.40	0.43
物价稳定	0.42	0.37	0.47	0.43	0.42	0.41	0.49	0.35	0.40	0.42	0.46
社会平等	0.44	0.38	0.40	0.44	0.47	0.41	0.40	0.46	0.43	0.48	0.50
住房保障	0.44	0.38	0.40	0.43	0.45	0.43	0.48	0.44	0.43	0.47	0.52
工资收入	0.45	0.43	0.45	0.43	0.51	0.48	0.43	0.43	0.43	0.45	0.48
政府廉洁	0.45	0.41	0.46	0.42	0.47	0.42	0.49	0.44	0.44	0.50	0.50
环境保护	0.46	0.38	0.41	0.44	0.46	0.45	0.49	0.51	0.40	0.45	0.56
政府回应	0.46	0.39	0.47	0.48	0.49	0.45	0.45	0.48	0.45	0.48	0.49
政府效率	0.47	0.41	0.47	0.49	0.51	0.47	0.47	0.47	0.43	0.49	0.48
失业保险	0.48	0.45	0.46	0.47	0.52	0.48	0.49	0.47	0.44	0.47	0.52
看病就医	0.49	0.42	0.46	0.49	0.48	0.50	0.50	0.49	0.49	0.49	0.55
扶助贫困	0.50	0.42	0.50	0.53	0.49	0.47	0.51	0.49	0.50	0.59	0.55
养老保险	0.52	0.49	0.50	0.50	0.56	0.49	0.51	0.49	0.50	0.54	0.60
公民权利	0.54	0.48	0.53	0.55	0.58	0.52	0.53	0.56	0.50	0.54	0.60
高考制度	0.56	0.52	0.51	0.58	0.56	0.53	0.59	0.59	0.54	0.59	0.62
工作机会	0.57	0.59	0.57	0.53	0.61	0.61	0.57	0.57	0.54	0.53	0.59
社会治安	0.57	0.56	0.60	0.52	0.62	0.58	0.61	0.53	0.55	0.58	0.58
言论自由	0.59	0.55	0.57	0.60	0.58	0.56	0.57	0.61	0.57	0.62	0.64
国家安全	0.64	0.62	0.62	0.67	0.63	0.63	0.66	0.63	0.62	0.67	0.67
民族和谐	0.66	0.66	0.66	0.69	0.65	0.67	0.70	0.59	0.63	0.69	0.69
政策满意度 综合指数	0.49	0.44	0.48	0.49	0.51	0.48	0.50	0.48	0.47	0.51	0.54

数据来源：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公共政策满意度定期调查，2013年10月

- 注：1) 颜色：黄色为10城市样本的平均值，蓝色为最低值，绿色为最高值；
- 2) 我们通过受访人对其它政策问题的有效回答来估算每项政策中的少量缺失答案(imputation)；
- 3) 政策满意度综合指数为20项政策指标的因子分析结果，最小值为零，最大值为1，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各项政策指标与综合因子之间都有较强的正相关系数(结果未显示)，说明综合因子可以较好地代表20项政策指标；
- 4) 在回归分析中，重庆、上海、沈阳和昆明的综合政策满意度明显高于其它6个城市(控制受访人媒体使用，民族，政治面目，年龄，教育，收入，户口所在地，工作时间，性别，和婚姻状况，见表二)。

物价、住房与工资收入应该是互相关联的三个问题，尽管近年来工资收入一直在增长，但其增长速度赶不上物价和房价的增长速度，从而导致民众对工资收入的不满意。起码到 2013 年底，政府对物价的调控以及对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建设，看来并没有起到提升满意度的效果。当问到对物价稳定的满意度时，有受访人调侃地说，“物价在高位稳定”。

社会平等、政府廉洁与政府回应民众需求是另外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虽然这三项中没有一项名列榜首，但民众也表示出相当的不满。尽管中共十八大之后政府在这些政策的实施上几乎是全力以赴，但与公众的期望值仍然有差距。

2) 满意度最高的前 5 项

表一还显示了通过加权后调查样本对各项政策满意度中最高的 5 项(最左边的竖行,黄色),分别为民族和谐(66%),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64%),言论自由(59%),社会治安和工作机会(并列第四,均为 57%),以及高考制度(56%)。

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高满意度并不难理解，中国国力的提高，国防科技的突飞猛进，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扩大，以及中国在南海和日本问题上的强硬立场，都应当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满意度。

工作机会的高满意度也并不奇怪，中国通过政府拨款，促进内需等方式成功度过了 2008 年以来的国际经济危机，



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是就业机会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电话调查中，我们时常会听到受访人在回答满意的同时，还会加上一些评论，例如“现在工作满地都是，就看你干不干”。

目前中国的高考制度虽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过分注重分数，只能在户口所在地参加考试等等，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个制度仍然是一个通过个人努力与奋斗取得成功的有效渠道，因此在民众心目中仍然具有较高的满意度。

社会治安的高满意度似乎有些意外，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中，物质财富急剧增加，人口大规模流动，以物质消费为标准的价值观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都是造成犯罪率上升的条件。可能有两个因素导致社会治安的高满意度，一个是政府防范和打击犯罪的力度大，另一个间接的因素，是相对多的工作机会和低水平的失业率，使得犯罪率高的年轻男性没有更多的机会和动力去偷东西或抢劫。客观上讲，中国与其他发展水平相当的金砖国家相比，社会治安应当相对要好。

从中国以往的民族政策来看，公众对民族和谐的满意度其实很自然，特别是在大城市，少数民族在入学，就业和其他社会政策上有一定的保障，从而使他们比较好地融入以汉族为大多数的中国社会。然而，如此高的民族政策满意度对西方人来说会有点出乎意外，因为西方媒体以往习惯于报道

中国的民族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新疆和西藏。中国的民众往往是通过官方媒体了解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冲突，将其视为极少数极端分子的恐怖行为，并不影响政府的民族平等政策。

另一个让西方人吃惊的是中国公众对言论自由相对高的满意度。西方喜欢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例如对网络的审查，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对家庭教会的控制，对外国记者在中国报道的限制等等，从而让人觉得中国的言论很不自由，但是对于生活在中国的百姓而言，他们发表自己看法的空间和批评政府的渠道都在不断扩大，当然仍然有些人不满意，但大多数人对此项政策表示出相当高的满意度，与西方人的印象形成很大的反差。

3) 满意度的历史变化趋势

最后，本文可以将 2013 年的数据与以往的调查数据相比较，如前所述，本文的数据可以概括从 1987 年到 2013 年这 26 年的变化，从而得出更具有历史感的结论。为了让数据分析更加简单易懂，本文挑选出 5 项有代表性的政策，分别为社会平等，收入水平，政府廉洁，物价稳定和言论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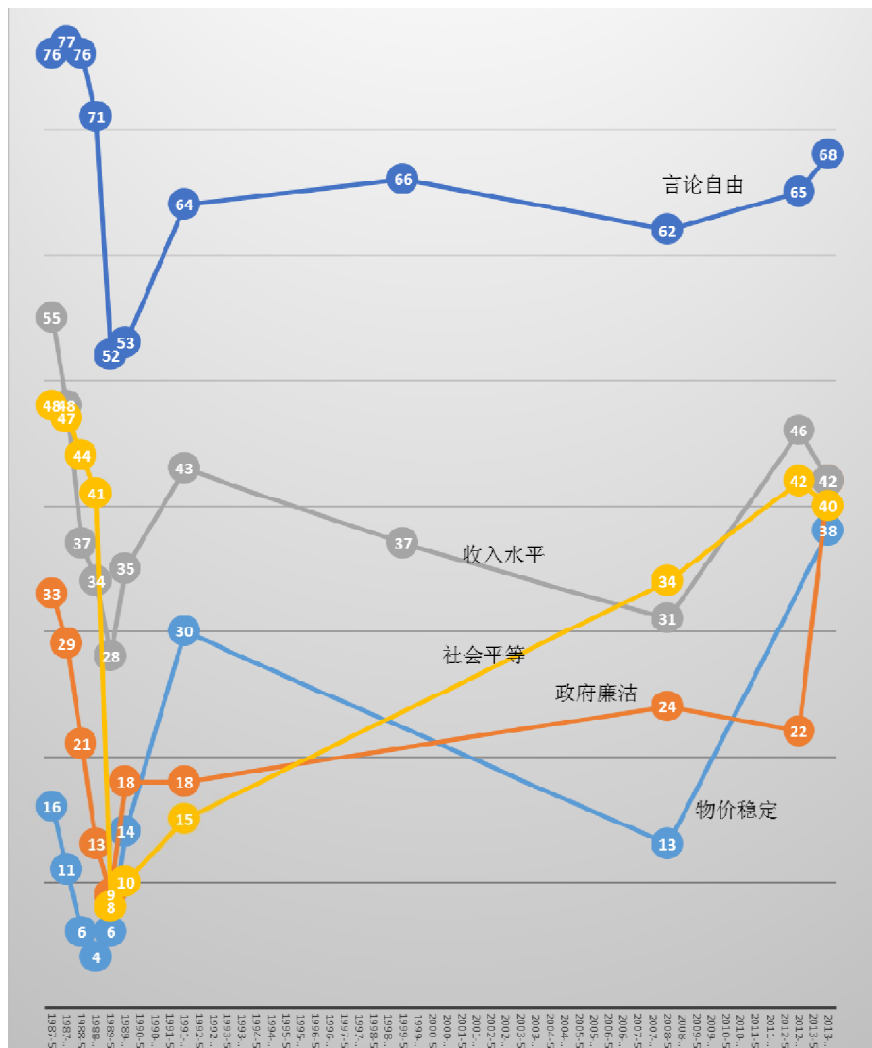
图一是上述 5 项政策满意度从 1987 年 5 月到 2013 年 10 月的变化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图一的满意度百分比是“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简单相加，而在表一中的满意度，则考虑到了“比较”和“非常”之间的差别，因此更加准确，



而图一中的百分比会偏高，但由于早期的调查只是问了满意或不满意，没有“比较”和“非常”之分，因此要与早期数据比较，就需要将“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合并。

图一、1987-2013 中国城市公共政策满意度

(加权%，包括不知道)



数据来源：1987-1992 体改委 40 城市调查，1999 年唐文方 6 城市调查，2008 年中国调查城市样本，2012 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城市样本，2013 年 10 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10 城市调查

在经历了 1989 年 5 月的历史最低点后，各项政策的满意度都有较大程度的回升，例如对言论自由，收入水平和社会平等的满意度都更加接近了 1987 年历史的最高点，对物价稳定和政府廉洁的满意度，甚至高于历史最高水平。

由于篇幅的限制，图一中无法显示更多的政策选项，如环境保护，工作机会，住房保障，看病就医，养老保险，社会治安。从本文作者掌握的数据来看，这些政策的满意度也都从 1989 年的低谷开始有较大程度的回升，其中工作机会和社会治安在 2013 年也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结果未显示)。

虽然物价稳定和政府廉洁的满意度在表一的各项政策中名列最低的前 5 项之中，但在过去 26 年来却在逐步改进，特别是与 1989 年相比。当然，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条件有很多，但如果说政策满意度跌落至历史最低水平是发生动乱的原因之一，目前的不满意程度则远远低于当时的水平。

总而言之，从政策种类来看，越是和百姓生活相关的政策，满意度就越低，例如食品，物价，住房，收入和环境。反之，当政策关系到国家层面而与百姓生活不是直接相关时，满意度似乎更高，例民族政策，国防与外交，言论自由和高考制度。从历史发展来看，目前的公共政策满意度有的正在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有的则已经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



三、政策满意度的决定因素

上一节比较了受访人对不同政策的不同满意程度，本节进一步分析什么样的人会更满意或更不满意，具体地说，本节将集中讨论三个方面的因素：地区分布，媒体效应，以及受访人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对不满意的影响。

1) 地区因素

表一中除了列出样本总体对各项政策的满意程度（黄色），还分别显示了 10 个城市的结果，其中蓝色为 10 个城市中的最低值，绿色为最高值。例如，就食品安全而言，总体样本的平均值为 38%（黄色），其中广州最低，仅为 28%（蓝色），重庆最高，达到 43%（绿色）。

各城市之间有几个有意思的区别。北京对高考制度的满意度在各个城市中最低，原因可能是北京的外来移民很多（在北京受访者中高达 53%），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没有机会在北京参加高考，因此很有意见。上海政府效率，社会治安和工作机会都名列榜首，说明上海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能比别的城市更强。深圳对工作机会的满意度与上海并列第一，可能是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昆明和西安对工

作机会的满意度均为最低，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城市在 10 个城市中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乌鲁木齐在 10 个城市中对民族和谐的满意度最低，看来与当地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有关。西安则对扶助贫困的满意度最高。

除了上述各个城市间零星的差别，表一中最有意思的发现是广州与重庆之间的差别。从整体来看，广州的政策满意度综合指标在 10 个城市中最低，仅为 44%，重庆最高，为 54%（表一最底下的横行）。从具体政策来看，重庆在 20 项政策满意度中有 14 项都是 10 个城市中最高的，而广州则在 20 项政策中有 15 项垫底。

为什么重庆满意度最高广州最低呢？这可能与两个城市政府的执政能力有关，仅从表面现象来看，重庆市民与政府的沟通渠道似乎更畅通，因为重庆市政府的网站（www.cq.gov.cn）所能搜索到的有关公共政策的信息远多于广州政府的网站（www.gz.gov.cn）。例如，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28 日，在两市政府的网站上搜索“食品安全”，重庆政府的网站上显示出 663 条相关信息，而在广州政府网上只显示出 53 条，“住房保障”在重庆有 1593 条，而在广州只有 29 条，“环境保护”在重庆有 1998 条，广州为 47 条，“价格”在重庆有 2215 条，在广州只有 157 条，显然两个城市有着巨大的差距。

当然，这个差距并不能说明广州市政府没有在这些政策



问题上下功夫，说不定广州政府的投入会比重庆更大，但从一个市民或网络用户的角度来说，在重庆得到政策的相关信息远比在广州容易，这也从侧面说明重庆政府起码从网站设计和提供信息方面来说，更能与公众贴近。当然，要想找更满意的答案，恐怕还需要对两个城市政府的运作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广州的市民很容易拿广州与香港对比，对个人权力和政府要求比较高。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两个城市的公众满意度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2) 媒体因素

中国的媒体在过去的 30 年经历了两个飞越。第一个飞越是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从传统的报纸广播向电视的飞越。当卫星电视信号已经覆盖了整个中国之后，中国又在本世纪初开始了从电视媒体向网络媒体的飞越，并且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的覆盖，据中国电信的公告，2012 年中国 3G 网络的平均覆盖率城市为 97%，农村为 92%³。

到 2013 年，中国的媒体处于电视与网络并存的局面，虽然网络发展迅速，但电视仍然是人们获取政治社会新闻的主要渠道。2008 年时，73% 的中国人通过电视了解时事新闻，只有 10% 左右的人通过网络了解新闻⁴。到了 2012 年，利用网络获取新闻的人数增加了大约一倍多，达到 22%，但是电

³ <http://www.askci.com/news/201302/10/1016105460133.shtml>. 点击日期为 2013-12-30.

⁴ 2008 年《中国调查》，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文理学院。

视新闻用户的比例仍在 71%左右⁵。在我们 2013 年 10 月所调查的 10 个大城市中，网络新闻的用户比例远高于全国的平均值，为 55%，但电视新闻用户的比例仍然高于网络用户，为 65%⁶。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随着网络速度的不断提升和网络服务费用的下调，网络新闻的用户无疑将超过电视新闻用户。本文将讨论不同媒体对公共政策满意度的影响。

在分析政策满意度的同时，本文也将同时讨论幸福感及其决定因素，公民的幸福感是最近国内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的调查中也包括了有关幸福感的问题，以使我们可以将国人的幸福感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图二显示了各国幸福感的对比，从 2008 年到 2013 年，中国人的平均幸福感基本上没有变化，在 64%左右，但是这在图二所列出的 25 个中南美、欧美和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是最低的。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例如经济发展水平，宗教，文化，历史等等。本文在这里先从个人的层面来分析影响幸福感的条件，至于宏观因素，将是以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表二的上半部分（前两个横行）显示了媒体对政策满意度综合指数和幸福感的的作用，数据来源是 2013 年 10 月的 10 城市调查。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电视新闻和网络新闻会对受访人的公共政策满意度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通过电视获取政治社会新闻会显著增加受访者的政策满意度，网络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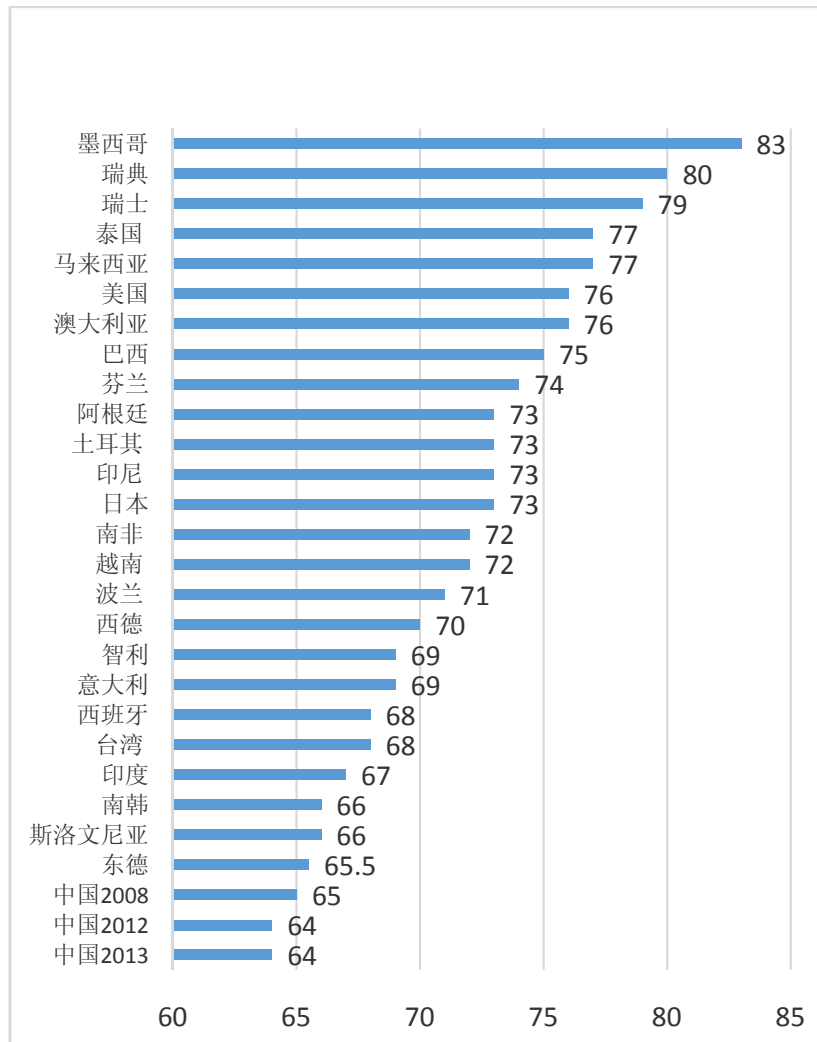
⁵ 2012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

⁶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中国公共政策调查》。



则会对受访人产生负面作用，显著降低其政策满意度，同时也显著地降低受访人的幸福感。媒体的影响独立于受访人的个人因素，如年龄、性别、教育、政治面目、收入，所在城市等等。也就是说，将这些因素都考虑到之后，媒体仍然有显著的影响。

图二、各国幸福感比较（加权%）



数据来源：2005-08 世界价值观调查，2008 年中国调查，2012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2013 年中国 10 城市调查

电视与网络的反差应当是在预料之中的。电视新闻总是以正面为主，自然会增加观众的满意度。网络则是网民发泄不满的场所，甚至成了造谣谩骂和暴民心理滋生的土壤，长期看网络“新闻”，会认为现实世界如网络描绘的那样黑暗，因此对政策产生不满，幸福感下降。庆幸的是，目前电视新闻的用户在全国仍然多于网络新闻用户，但今后后者几乎可以肯定会超过前者，因此对网络的改进刻不容缓。

中国目前对网络的治理方法比以前的粗暴删帖有了很大进步，例如实名评论，以法制网等等，但是仍然难以克服网络对民意的负面作用，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恐怕应当转守为攻，从内容和形式上入手，注入更多的正面信息，但在形式上又不能是简单的宣传，如果加入轻松调侃的形式，年轻人会更容易接受。美国有一个电视/网络节目，叫 The Daily Show，是不喜欢看主流媒体的年轻人获取政治新闻的主要渠道，虽然该节目充满了调侃和讽刺，但是它仍然在向年轻人传播主流社会的价值观。

3) 个人因素

最后，表二的回归分析中还包括了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对受访人政策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影响。这些因素有政治面目，收入，教育，是否本市户口，民族，年龄，工作时间，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所在城市。



党员和高收入群体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均高于非党员和低收入群体，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组人是现行政策的受益者。

有意思的是，户口不在本地的流动人口的满意度与幸福感均高于本地户口。从常理来看，城市本地居民更应该是城市各项公共政策的受益者，但他们反而更不满意、幸福感更低。一个原因是城市居民更多感到流动人口在与自己竞争城市的各项服务设施而感到不满，另一个原因是流动人口从更小地方到大城市来，初次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而感到满意和幸福。

表二、 媒体与个人因素对政策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影响
(OLS 多重回归分析)

	政策满意度 (0-1)	幸福指数 (0-1)
看电视新闻	0.027***	0.019
看网络新闻	-0.071***	-0.033**
党员	0.029***	0.049***
收入水平 (1-5)	0.027***	0.059***
非本地户口	0.019**	0.032***
已婚	0.003	0.038**
教育 (学位 1-7)	-0.013***	-0.012***
男性	0.002	-0.043***
少数民族	-0.041***	-0.019
工作时间 (0-3)	-0.008**	-0.005
18-29 岁 (参照组)		
30-39 岁	-0.033***	-0.033***
40-49 岁	-0.030**	-0.065***
50-59 岁	-0.007	-0.032
age60-89 岁	-0.027*	-0.049**

续表

	政策满意度 (0-1)	幸福指数 (0-1)
常数	0.554***	0.605***
样本量	1,991	1,962
R-squared	0.112	0.101
*** p<0.01, ** p<0.05, * p<0.1		

数据来源：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中国公共政策调查》。

注：1) 各变量的均值请见附录一；

2) 城市未显示，但包含在回归等式中，其中重庆、上海、沈阳和昆明明显高于其它城市。

已婚人群的幸福感知明显高于未婚者，这也符合社会学的理论，一般人在生活中安定下来后，幸福感会增加。

教育程度高反而会降低满意度和幸福感，这一发现也符合社会科学理论的预期，受教育越多，权利意识越强，掌握的信息越多，期望值越高，批评态度越明显，这一现象在任何社会都存在。所不同的是中国以前的教育有更多的政治内容，受教育的结果反而是增加了对政策的认同，而现在的教育更加注重知识的积累和分析能力的加强，在这一点上中国越来越趋同于其它社会。

男性的幸福感低于女性，可能是男性的期望值更高，更不容易满足，也有可能是男性的社会经济压力更大。

工作时间长的人和少数民族的满意度低于工作时间短的人和汉族大多数。工作时间的影响不难理解，但是少数民族的满意度低需要引起注意，有可能是少数民族的期望值过高，也有可能是因为政策的确向少数民族倾斜的不够。



年龄的效果大致可以用一个U字来形容，两头的人群高于中年人，特别是30-39和40-49这两个年龄段，无论是在工作，家庭和经济上，压力都比两头的人更大，因此满意度和幸福感都更低。

总之，本节重点讨论了影响政策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地区因素，媒体因素和个人因素。地区因素最突出的发现是重庆和广州之间的差别，前者的满意度远高于后者，原因可能与两市政府的执政能力，特别是与民众沟通能力的差别有关。媒体因素最重要的发现是网络媒体与电视对满意度截然相反的作用，前者导致满意度和幸福感的下降，后者却有利于提高满意度，虽然目前电视媒体仍然在中国占主导地位，但是将来网络很有可能超过电视，改变网络媒体对满意度和幸福感的负面作用是当务之急。最后，个人因素基本符合生态社会学的预期，生活压力大的和没有更多受益于公共政策的人群，满意度和幸福感往往偏低。

四、政策满意度与维权行为

上两节讨论的是政策满意度的分布情况以及影响政策满意度的若干条件，为了使本报告更加完整，本节将进一步分析政策满意度可能产生的后果，具体地说，本节将讨论当

人们对某项政策不满意时，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1) 维权行为分类

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专门为了维权行为而设计的：

如果您受到政府非常不公平的待遇，或对政府的某项政策非常不满，例如强制拆迁、或被城管无理处罚，通常您最有可能采取什么行动？您是 1) 上访、游行、请愿、示威，2) 或采取更激烈的手段，3) 还是上法院，4) 找媒体，5) 托熟人，6) 上网呼吁，7) 还是找政府有关部门，8) 或是什么也不做，忍了？（限选一项）

在设计上述问题的选项时，我们主要想从三个方面考量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政治行为，第一是维权行为的程度，如果遇到问题不去维权，什么也不做，忍了，说明维权行为的程度低，相反则说明政治上的活跃程度高；第二个方面是传统维权渠道与新兴渠道的区别，传统渠道包括用了找熟人和找政府有关部门，新兴渠道有法院，媒体和上网，用新兴渠道越多，越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第三个方面是维权行为的对抗程度，如果遇到事情就去上访游行或请愿示威，甚至采取更激烈的行为，则说明对抗性强，如果寻求通过政府有关部门解决问题，则说明对抗程度低。

调查结果发现（详见附录一），只有 21% 的受访人回答说如果遇到政府不公平待遇会什么也不做，79% 会采取某种行



动维权，这说明中国城市居民政治活跃程度相当高。第二，新兴渠道与传统渠道不相上下，前者加起来有 30%(法院 9%，媒体 13%，上网呼吁 8%)，后者一共是 28%(政府部门 25%，找熟人 3%)，这一状况符合目前中国新旧制度重叠的转型社会政治体制。第三，抗争性行为的比例高达 12%(上访游行请愿示威占 10%，采取更激烈的行为占 2%)，民众中的抗争性如此之高，说明中国目前起码在大城市中存在相当大的潜在不稳定因素。

2) 满意度与维权行为

上述维权行动，只是一个简单的百分比分布，不能预测当民众对公共政策不满意时会做出什么行动，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还要对维权行为做多重回归分析。除了关心政策满意度与维权行为的关系，我们同时还想看看当受访人对政府本身不满时会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的调查中涉及了受访人对各级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包括社区政府，市政府，和中央政府，结果发现社区政府和市政府的满意度均为 59%，而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则明显高于下两级政府，达到 70%。

有人可能认为如此高的政府满意度可能是受访人没有说实话，但是有证据显示⁷，受访人中没有说实话的比例小得

⁷ 见 Wenfang Tang and Yang Zhang, "Testing political sensitivity in Chinese survey data," University of Iowa.

可以忽略不计，受访人有时候宁愿说不知道，也不会说违心的话。其它研究证明，中国政府的高信任度和满意度是因为其回应民众的需求度高。中国政府无法像有直接选举的国家那样通过选票获得民众的信任。直接选举只要赢得简单多数选票就能执政，而不用顾及其他人，因此回应度不会很高。在中国，只要有少数人游行请愿，政府就要做出回应，其回应度通常会高于直选体制下产生的政府⁸。

表三对受访人对各级政府不满意或对公共政策不满意与维权行为的关系作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不满情绪最容易导致受访人的抗争行动，特别是激烈的抗争行为。无论是对社区政府的不满，对市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不满，还是对公共政策的总体不满意，最容易引发的是比上访游行更激烈的行为，对社区和市政府的不满同时还会引发诸如上访游行和示威请愿一类的行为。

相比其它政策（结果未显示），对政府回应度或保障公民权利的不满意更容易激发激烈的行动，对国防外交政策不满时，受访人更容易采取游行示威的手段，这一点从侧面证明了外界认为中国政府有时为了平息内部的政治不稳定因素而在外交政策上异常强硬⁹。

另一方面，无论是对哪一级政府不满还是对政策不满，第二个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都不做，也就是说，不满情绪最

⁸ 见唐文方，“政治信任度之比较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13.7。

⁹ Shirk, Susan, ed. 2011. *Changing Media, Changing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有可能造成两个极端的后果，要不什么都不做，要不就是做出激烈的举动。从治理的角度来说，两者都不可取，过激行为对缓解社会矛盾没有帮助自然不用说，什么也不做说明百姓对解决问题不抱希望，从侧面反映了他们的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转化成过激举动。

表三、政府满意度与政策满意度对维权行为的影响

(logit 回归分析)

	采取上访 游行以外 更激烈的手段	什么也 不做忍了	找媒体	上网 呼吁	找关系	上访 游行	法院	找政府 有关部门
对社区政府不满	1.858***	0.874***	-0.055	0.17	0.679	0.658*	-0.767**	-0.848***
对市政府不满	1.244*	0.949***	0.47	0.416	0.665	0.625*	-0.604	-1.420***
对中央政府不满	1.514**	0.948***	0.832**	0.735*	1.464**	0.064	-0.950**	-1.582***
对政策总体不满	6.194***	2.112***	1.205***	1.061**	0.738	0.313	-1.369***	-3.235***

数据来源：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公共政策满意度调查，2013-10

注：每一个满意度变量是一个单独的自变量，与 8 项维权因变量做分析，因此表中包含了 4x8=32 个回归等式，每一个等式中还包括下列其它自变量：电视新闻，网络新闻，民族，政治面目，年龄，教育程度，户口所在地，收入水平，工作时间，性别，婚姻状况，所在城市。

媒体和网络作为新兴的参与渠道似乎正在发挥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对中央政府或总体政策不满意时，受访人更有可能利用这两个管道，这应当是值得欢迎的好事，因为它一方面说明了媒体与网络的监督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说明了民众对它们的效果的承认。从具体政策来看(结果未显示)，对政府回应度，公民权利，和政府工作效率的不满更容易引

发受访人利用网络和媒体进行维权¹⁰。

令人失望的是，法院和政府部门对发泄不满不光没有促进作用，反而受到受访者的抵制，也就是说，越不满越不会去找法院或政府部门。法院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兴渠道，也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看来现在还无法发挥其预想的作用。政府部门是传统意义上解决问题的重要渠道，但从表三的分析结果来看，越不满就越不去找政府，反而会去采取与政府对抗的更激烈的手段，或者什么也不做，这种状况似乎说明政府内部机制运作的不协调或解决问题的渠道不畅通。

3) 维权行为的个人特征

最后，如表四所示，笔者对各类维权行为的个人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包括受访人的民族，政治面目，年龄，教育程度，是否本地户口，收入水平，每天工作时间，性别，婚姻状况，所在城市，以及媒体使用情况。

表四中统计意义上显著的结果有：1) 越是少数民族，越年轻，学历越低，越是男性，就越有可能使用激烈手段维权；2) 年龄越大，收入水平越低，就越有可能不采取任何行动；3) 利用媒体维权的更有可能是汉族，年轻人和受过更多教育的人；4) 通过网络维权的更有可能是汉族和高收

¹⁰ 表三还表明，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会导致受访人找关系托熟人的行为，我们暂时还不能确定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入的未婚女性；5）本地户口持有者比外地人更有可能上访游行；6）每天工作时间越长越不会去法院；7）通过政府部门维权的更有可能是少数民族或党员；8）女性宁愿去找政府，也不愿意去法院。

表四中媒体对维权的作用有些出乎意料，无论是电视新闻或网络新闻用户，都不太有可能采取激励手段维权，虽然网络新闻用户更有可能采取行动，但这些行动只限于通过媒体或上网呼吁和找关系托熟人，而不是上访游行或更激励的手段。西方有些人曾经对网络寄予厚望，认为网络在“阿拉伯之春”中成功地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但也有其他西方学者认为，网络的发展使人们更多地生活在虚拟世界中而不利于人与人的交往，反而抑制了集体政治参与¹¹。我们的调查结果似乎更支持后者的观点，网络虽然会增加人们的不满情绪（见表二），但这些人只会抱怨而不愿意有真正的行动。有意思的是，官方色彩比较明显的电视新闻反而会促进人们通过上访请愿游行示威来维权，看来政府通过电视新闻的播出手法和内容值得反思。

此外，我们的调查中还包括了受访人的社会交往以及法律认知有关的问题。前者包括两个问题，受访人是否经常参加同学同事聚会或社区内的集体活动以及受访人是否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这两个问题用来测量受访人的社

¹¹ Morozov, E. (2011). *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 PublicAffairs Store.

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在政治学理论中，人们通常认为社会网络与人际信任会导致政治参与特别是群体性政治参与¹²。法律认知的问题是受访人是否同意法律哪怕不合理也应该服从（恶法也是法），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制建设的难题是人们普遍对法律的不认同¹³。

表四中，法律意识越强的人，就越有可能不采取维权行动，尤其不会去上网呼吁。同时，法律意识对通过法院维权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守法的人本来就没有必要去法院。正如一般人所预期的，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显著提高了采取维权行动的可能性，特别是社会网络对非正规渠道（激烈行为和托熟人）的维权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如何继续加强人们的法制观念，以及如何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所激发的维权行为从非正规渠道转化为正规渠道的参与，将是对未来政治改革的考验。

¹² Inglehart, Ronald. 1999. "Trust, Well-Being and Democracy," in *Democracy and Trust*, ed. Mark E. Warr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ladwell, M. (2010). Small change. *The New Yorker*, 4(2010), 42-49.

¹³ Liebman, Benjamin. 2011. "A Populist Threat to China's Courts?" in Margaret Y. K. Woo and Mary E. Gallagher, eds. *Chinese Justice: Civil Dispute Resolu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llagher, Mary Elizabeth and Wang, Yuhua. 2011. "Users and Nonusers: Legal Experience and its Effect on Legal Consciousness," in Margaret Y. K. Woo and Mary E. Gallagher, eds., *Chinese Justice: Civil Dispute Resolu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表四、维权行为的个人特征

(logit 回归分析)

	采取上访 游行以外 更激烈的手段	什么也 不做忍了	找媒体	上网呼吁	找关系	上访游行	法院	找政府 有关部门
汉族	-1.063**	0.432	0.623*	0.663*	-0.321	-0.451	0.18	-0.450**
党员	-0.827	-0.015	-0.261	-0.26	0.268	-0.109	-0.027	0.258*
年龄组 1-5	-0.374*	0.132*	-0.222***	-0.159	-0.056	0.076	-0.112	-0.037
学位 1-7	-0.526***	-0.046	0.170***	0.048	0.036	-0.014	-0.013	0.056
本地户口	0.335	-0.097	-0.192	-0.069	-0.449	0.317*	0.053	0.079
收入水平 1-5	-0.032	-0.143**	0.016	0.151*	-0.119	0.092	-0.017	-0.021
工作时间 0-3	-0.107	0.047	0.016	0.034	0.115	0.049	-0.225***	0.017
女性	-1.576***	0.001	-0.035	0.366**	-0.309	-0.205	-0.414**	0.218*
已婚	0.266	0.079	0.23	-0.435**	0.308	0.127	-0.115	0.082
广州	-0.587	0.151	0.465	-0.322	-1.915**	0.842**	-0.133	0.069
深圳	-0.344	0.108	0.547*	-0.011	-0.788	1.097***	-0.951**	-0.046
武汉	0.784	0.278	-0.118	0.231	-0.048	1.071***	-0.503	-0.349
北京	-1.306	0.545*	-0.289	0.04	-0.049	-0.258	0.064	0.165
乌鲁木齐	0.792	0.3	-0.57	0.236	-2.393**	0.085	-0.407	0.478*
昆明	0.492	0.15	0.333	0.034	-0.816	0.446	-0.467	0.111
沈阳	1.2	0.396	-0.022	-0.043	-1.281*	1.129***	-0.870**	-0.134
西安	0.807	0.646**	-0.009	0.135	-0.161	0.455	-0.605	-0.407
上海	1.286	0.331	-0.168	0.526	-1.828**	0.472	0.208	-0.336
重庆-参照组								
电视新闻	0.025	-0.126	-0.039	-0.043	-0.588	0.860***	0.159	0.044
网络新闻	0.837	-0.572***	0.519**	0.655**	1.403***	-0.415*	0.137	-0.005
社交聚会	1.014*	-0.597***	0.193	-0.01	1.056**	0.303	-0.068	-0.052
人际信任	-0.068	-0.333**	0.017	0.093	0.334	0.242	0.11	0.09
恶法也法	-0.637	0.642***	-0.074	-0.903***	-0.058	-0.034	-0.104	0.136
常量	-4.916***	-2.571***	-3.820***	-3.502***	-4.425***	-3.914***	-0.544	0.4
样本量	1,807	1,807	1,807	1,807	1,807	1,807	1,807	1,807
Pseudo R2	0.254	0.068	0.065	0.062	0.119	0.060	0.042	0.057

*** p<0.01, ** p<0.05, * p<0.1

数据来源：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公共政策满意度调查，2013-10

注：各个回归等式中还包括了对社区政府，市政府，中央政府以及对公共政策的满意度（未显示）

本节重点讨论了维权行为的分类，公众对政府和政策的满意度对维权行为的影响和维权行为的个人特征，其主要发现可以归纳如下：1)中国城市居民的维权参与程度很高；2)其中抗争性维权行为的比例也高出一般人的预期；3)在对政府和政策不满意时，公众的反应趋于两个极端，要么采取激烈的行为，要么什么都不做，两者都不利于中国今后的社会发展；4)法院在维权参与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5)网络媒体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空间，但并不能鼓励人们去行动；6)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是维权参与的更重要原因，但它们却鼓励人们通过非正当渠道去参与，不利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健康发展。



五、结论

本文以 2013 年末中国 10 个大城市的民意调查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当前对各项公共政策和各级政府的满意程度、原因及其后果。分析结果可以用喜忧参半来总结。

从积极的意义来讲，民众对政府的各项政策的总体满意度相当高，虽然对各项具体政策的满意程度有高有低，但是满意度最低的大都是涉及到民生的问题，如食品安全，物价，住房和收入，而百姓对涉及到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如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却表现出较高的满意度。虽然民众对政府廉洁和收入水平仍然不满意，但其程度与 1989 年 5 月历史最低点相比，还是有了很大的提升。此外，民众对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满意度也持续走高。再有，虽然网络的快速发展对网络的管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而且网络正在被人们越来越多地用来发泄不满，但我们的调查没有证据显示网络能有效地组织群体政治行动。所有这些发现都为目前中国城市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起到了促进作用。

同时，我们的调查还揭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虽然现在民众对政府和政策相对满意，但是一旦出现不满，他们表现出采取激烈举动维权的意愿相当强烈。之所以通过非

正常渠道维权，一个问题是正常渠道的不畅通，例如法院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虽然过去在党内民主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¹⁴，今后对维护社会稳定的挑战是如何推动整个国家的制度化建设，使民众发泄不满和维权行动从非正规渠道向正规渠道转变。要做到这一点，政府首先应该做出表率，通过正规渠道，例如司法部门和政府机构，回应民众的要求，而不是靠下达紧急灭火通知或开除某个政府官员来解决问题。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才能保证政权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

¹⁴ Zheng, Yongnian (郑永年). 2010.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Routledge.



附录一、变量的统计特征

变量名	样本量	加权	均值	标准误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区政府满意度	1904	1898	0.59	0.22	0	1
市政府满意度	1904	1898	0.59	0.20	0	1
中央政府满意度	1904	1898	0.70	0.20	0	1
政策总体满意度	1996	1992	0.49	0.16	0	1
幸福感	1967	1967	0.64	0.22	0	1
激烈手段	2000	2000	0.02	0.13	0	1
上访游行	2000	2000	0.10	0.30	0	1
法院维权	2000	2000	0.09	0.28	0	1
媒体维权	2000	2000	0.13	0.33	0	1
政府维权	2000	2000	0.25	0.43	0	1
上网呼吁	2000	2000	0.08	0.27	0	1
找关系	2000	2000	0.03	0.16	0	1
忍了	2000	2000	0.21	0.41	0	1
电视新闻	2000	2000	0.65	0.38	0	1
网络新闻	2000	2000	0.55	0.42	0	1
社会交往	1991	1989	0.50	0.36	0	1
人际信任	2000	2000	0.57	0.49	0	1
恶法也法	1901	1870	0.57	0.30	0	1
汉族	2000	2000	0.92	0.27	0	1
党员	2000	2000	0.20	0.40	0	1
18-29 岁	2000	2000	0.24	0.43	0	1
30-39 岁	2000	2000	0.24	0.43	0	1
40-49 岁	2000	2000	0.22	0.41	0	1
50-59 岁	2000	2000	0.16	0.36	0	1
60-89 岁	2000	2000	0.14	0.34	0	1
学位	2000	2000	4.51	1.53	1	7
本市户口	2000	2000	0.59	0.49	0	1
收入水平	2000	2000	2.24	0.97	1	5
工作时间	1995	1993	1.73	1.06	0	3
女性	2000	2000	0.45	0.50	0	1
已婚	2000	2000	0.74	0.44	0	1
广州	2000	2000	0.10	0.30	0	1
深圳	2000	2000	0.10	0.30	0	1
武汉	2000	2000	0.10	0.30	0	1
北京	2000	2000	0.10	0.30	0	1
乌鲁木齐	2000	2000	0.10	0.30	0	1
昆明	2000	2000	0.10	0.30	0	1
沈阳	2000	2000	0.10	0.30	0	1
西安	2000	2000	0.10	0.30	0	1
上海	2000	2000	0.10	0.30	0	1
重庆	2000	2000	0.10	0.30	0	1



IPP 公共政策专题研究报告目录

2014 年

- 第二期 中国城市居民公共政策满意度调查报告
- 第一期 再塑意识形态：如何区分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并构建它们

2013 年

- 第十二期 林权改革与生态文明——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困局及如何重新设计改革
- 第十一期 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看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地域流动
- 第十期 以开放促改革：如何赢得新一轮开放政策
- 第九期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动态与中国应有的积极战略思考
- 第八期 中国崛起过程中必须思考的十二个重大问题
- 第七期 21 世纪中日民族主义的冲突：如何防止中国的现代化再次被中断
- 第六期 美国页岩气革命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第五期 平衡美国：中国应当有的战略思考
- 第四期 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一种以制度创新促制度改革思路
- 第三期 中国海洋地缘政治与中美关系：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第二期 城市化和城市体制改革问题
- 第一期 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怎么走

2012 年

- 第六期 如何有效反腐败
- 第五期 中国经济改革的下一步
- 第四期 日本新保守政治势力的崛起和我国的对日政策选择
- 第三期 拓展改革话语，明确改革路径，推进改革进程
- 第二期 十八大之后我国社会秩序重建问题
- 第一期 关于广东当前农村社会稳定及社会建设的几点建议——“乌坎”等事件妥善解决的启示和思考